

史记二十讲

梁启超 王国维等 著 韩兆琦 周 旻 选编



伟大传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华夏出版社

伟大传统

史记二十讲

梁启超 王国维等 著
韩兆琦 周 旻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二十讲 / 梁启超等著; 韩兆琦等选编.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3
(伟大传统)

ISBN 978-7-5080-5072-0

I. 史… II. ①梁…②韩… III. 中国—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37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伟大传统：史记二十讲

著 者: 梁启超 王国维等

选 编 者: 韩兆琦 周 旻

丛书编辑: 林媛韩

本书责编: 林媛韩

特约编辑: 张国功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封面构图: 沈继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87×1092

印 张: 22.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5072-0

定 价: 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策划者言

“传统”无疑是一个蕴涵着情感力量与神圣感召力的字眼。即使是在我们义无反顾地以加速度的姿态,不计成败地奔向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乃至于后后……现代的今天,提及它,依然能够触及灵魂般地打动我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就像决绝离家出门远行去闯荡天下的浪子,在疲累的途中偶尔歇息之际,或者在一个喧嚣散尽的夜晚蓦然回首时分,尽管触手繁华,远方的诱惑依然精彩,但那一刻他最思念的,却是那个我们由此出发、愈行愈远的家。

自1840年那个转换的年份以来,中国文化整体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峻急与悲凉这两种看似相反却适相成的色调。“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钱穆《国学概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急迫的救亡与启蒙,使得人们在不断地求变与重建中难以真正安顿自己的身心。而屡次遭遇的挫折,与围绕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物/心、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等多种尖锐的冲突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求索,又在心底催生起无尽的悲凉,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生逢斯时斯世,在过去很多年里,国人的求索豁显了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伤害了更多的东西,其中,我们伟大的传统成了受创至为深痛的东西。以至于当我们对传统的评价仍然欲说还休时,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却早已凸显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更为深切的感受是,简单地抛弃传统的行囊并没有让我们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反而使“何以安身立命”

成为一个焦虑至极的问题。而不知道幸运抑或不幸,到今天,当“国学热”、“读经热”在商业大潮中悄然兴起的时候,“传统”已经成了一处被各种理论、学说、话语、流派与主义包围、冲刷、纠缠与撕扯的中心地带。出于各种复杂化的处理,使得我们逐渐忘记了赖以生存的传统究竟为何物,因此也就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她。对血液一样流淌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我们已经极度陌生,甚至视而不见。

拂开来路上无尽的喧哗与浮躁,站在新时代清明开阔的舞台,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渐入佳境,进行文化再造,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对于传统,我们更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之中“老生常谈”,“接着讲”那些我们习惯于忽略或误读的常识:

——传统不是过时的死的东西,而是永恒的活的东西;现代化并不是反传统,而是传统的自觉更新。甘阳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一文,也许仍有重温的意义。他批评了将传统视为僵死固定的现成之物,将“继承传统成了复制过去,光大传统也无非加大投影”的传统观。他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因此,“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只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要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传统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存在。“物相杂,故曰文。”传统之所以蕴涵神圣的力量,就在于她的多资多源而不是定于一尊,就在于她的相互激荡而不是沉寂无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

径。”(陈寅恪语)这是哲人的彻悟,也是我们对待传统与新知需要明确的态度。

——传统是需要不断叙述与呵护的。“三代穿衣,五代吃饭。”希尔斯说,从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就可以看做是传统。他同时还强调,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传统”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她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的接续与传承息息相关。余英时曾经总结一代大儒钱穆终生著述目的之所在,就是立志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我们无法企及每一个人都达至这样的文化高度,但出版的使命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共同的完善”而尽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以出版为志业的人,都应该为疗救这个时代的病症而努力。要勇于担当,并且能够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责任。

.....

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与信念,我们推出了这套“伟大传统”丛书。

文化建设是一个濡化而非革命的过程。出于平实而非高调的态度,我们以一种整理而非原创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伟大传统”,尤其是将近百年来哲人智者对待传统的净言慧语重新提出,放在读者诸君面前,以期用心聆听、咀嚼与回应。当中国的崛起开始以生产力增长为特征转化为以文化力增长为特征时,出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的文化再造和学术建设。抬头看山,路在脚下。用心梳理、了解与接续传统,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无法一时全景式地打开中华伟大传统的视窗,但我们希望能够触及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最为精彩的人文风景。因此,在这个丛书之下我们推出了关于儒、道、佛的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元

典精神如《论语》、孟子、孙子等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性风景，如《楚辞》、《诗经》、魏晋人物的二十讲。至于筹划之中的，还包括器物等层面的二十讲。希望能够逐渐让我们的视野开阔起来，层次丰富起来。

庭院深深，我们无法通过有限的“二十讲”尽览伟大传统的幽深风景，但我们希望充当一个尽职合格的导游，由此导引读者走进传统文化的家园，进而自己去寻幽探胜，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传统文化的风景说明书上。

.....

漫步在中华历史丰饶的田野，传统文化的巡礼无疑是一种无上的愉悦。心存感恩，此时此刻，我们提醒自己：“慢慢走，欣赏啊！”现代人走得太快了，是会丢失灵魂的。

编者序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司马迁的生年有两个说法,一说是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说都有很多的根据,学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出土资料前,都难以否定另一方。司马迁青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耕过田、放过牛,因为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所以到二十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国内的各种兴作变革也接连不休,再加上汉武帝迷信神鬼,祭祀求仙一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又扈从着去过许多地方。元鼎六年(前110),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在今云南、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到过邛、笮、昆明等地。

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病在垂危。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至太初元年(前104),撰写《史记》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至天汉二年(前99),已经埋头写了六年《史记》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原

因是这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武帝让李广的孙子李陵为李广利运送物资，李陵不肯，自请率兵独当一面。经再三请求，武帝让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北行，以分匈奴兵势。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了匈奴大军。李陵与部下虽经英勇战斗，但终于因为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李陵也放下武器被匈奴人俘去。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变平时称道李陵的故态，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深感不平。当武帝问到司马迁对此有何看法时，司马迁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又说一支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相遇，打得如此卓绝，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这使武帝大为震怒，他认为司马迁是在转弯抹角地攻击李广利，而且有对皇帝不满的意思，于是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司马迁因为《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是对其肉体、精神的一种极大摧残。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生死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这些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白，在《史记》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免焉。”他说：“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已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忍辱发愤著书”，但这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司马迁受刑后，由于条件适合，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小官，司马迁之所以要接受这个职务，正是由于这个职务可以使他更有机会接近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而这些是他写作《史记》所不能缺少的。就这样，他又忍辱奋斗了六年，到太始四年（前93），他的朋友任安因犯事下狱，任安从狱中给司马迁写信后，司马迁便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史记》已经写完了。《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考定在太始四年，对此人们也

还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司马迁的死因与死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总体说来应该是在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以后的临近几年间。司马迁的著作,除了《史记》与《报任安书》外,还有一篇不长的《悲士不遇赋》。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

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

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以及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语言描写和作者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试回想其中的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叹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前辈学者李长之和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 H. Plakes)都把《史记》称作是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影响后代的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五十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一百九十一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司马迁才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传记文学之祖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本书编选了二十篇研究《史记》的文章,以期给爱好《史记》的朋友们提供一点进一步研读《史记》的线索。所选文章从近现代开始,直至

当代,有的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的是单篇论文。

近现代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些前辈学者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指出不应仅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而应将其视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考据、辞章之外探究其真正的写作意图,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第一次详细论证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而李长之则列举了十条理由,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的观点。高步瀛的《史记举要》对《史记》的流传、笔法及其与先秦学术的关系等各方面作了精彩的论述。其他如张鹏一的《〈太史公年谱〉序》、李笠的《〈史记订补〉叙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史记》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并使用的文献,我们把它们收录在一起,以便于读者查阅。

对于现当代的《史记》研究,我们选择了一些在《史记》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涉及《史记》的思想、学术、文学、史学、文献研究以及如何学习《史记》等。其中有的文章是全面的论述,有的则专论一个方面,如论《史记》“三家注”、《史记》的论赞、《史记》的纪传体、《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与秦汉学术的关系等。

本书的编选目的不是全面反映现当代《史记》研究的盛况与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没有选入,比如钱鍾书先生的《管锥编·史记汇注考证》、朱东润先生的《史记考索》、程金造先生的《史记管窥》、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以及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史林杂识》等论著中有关《史记》的论述,以及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优秀的《史记》研究成果能够汇集成册,那定当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

韩兆琦、周旻

2008年11月4日

目录

一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 1

梁启超

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二 太史公行年考 11

王国维

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按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三 《太史公年谱》序 31

张鹏一

史公《自序》学术上宗孔子,推重《春秋》,其为百三十篇之作……述故事,整齐世传宗旨,一本《春秋》矣……至创制体例,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非苟焉已也。以孔子列世家,弟子、孟、荀列列传,传其业者复列儒林,此百三十篇之主要典章制度由此其出也。项羽非帝王列入本纪,陈涉起事不满一岁而列世家,此《春秋》改制新王之义,言能伐暴

救民者,其人虽不足取,而其事已开帝王之局……匹夫敢于发难,将相出于平民,自此以后,中国历朝治乱不同,而易姓改革不能出此范围。史公具此特识,撰成《史记》,上以结三代以来之大局,下以启汉魏以后之天下,此谱史公事实为其中一要义。

四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36

李长之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无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

五 《史记订补》叙例 41

李 笠

况《史记》自当代已无完书,经褚少孙、刘歆、冯商等之补苴,杨终之删改,乖戾踳驳,益难究诂。而世之读史者,务览其盛衰治乱之要,其于字句音训之间,率以为烦琐而忽之,遂令别风淮雨,大义愈乖,故后之治《太史公书》者,不急夫诠注而急夫考订也。

六 《史记举要》序 49

高步瀛

后之为史者,莫不以记载确实、体例严整为职志,然二者非史公之所屑屑也。史公之为书,每窃比于《春秋》,而又不袭《春秋》之迹。《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史公寓义例于文字。其于汉家政治,恒见不满之意,不知者目为谤书,然其不以扰乱之制为已足,

必欲进于升平太平之治者,正《春秋》之旨也。夫进化之旨,今日史家称为创获者,而史公于二千年前已实行之,何其伟乎!

七 汉文学史纲要·史记 64

鲁 迅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八 经典常谈·史记 67

朱自清

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

九 中国史学入门·史记 74

顾颉刚

《史记》的价值,特别在于司马谈所写的楚汉相争年间的事,和司马迁所写的汉武帝时的事。他们父子在写史时,没有多少顾忌……在此之后的历代写史者,写史书都不敢直言当时的事……司马迁不是死读书的人,所以,他写的《史记》是不朽的。他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

十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 78

钱 穆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

十一 白寿彝先生论《史记》 107 白寿彝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过去，观察未来……“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却要来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

十二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节选) 150 李长之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十三 郑鹤声先生论《史记》的制作 186 郑鹤声

马迁先人本掌文史之事，故极重视文学，尝恨没世而文采